

# 休闲之都： 成都游乐文化的历史成因与特点

何一民

【摘要】 成都不仅是经济发展快速的特大城市,而且也是休闲文化兴盛的城市。当代成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文化禀赋,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 成都;尚游好乐;生活态度

【中图分类号】 K8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2-0056-8

21世纪以来,成都一方面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并称为休闲之都。当现代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钢筋水泥般的城市森林令人窒息之时,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被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所称道。

但是,成都人优雅、舒适、逸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才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

生命文化禀赋。正是因为如此,古代成都人一方面非常勤劳,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在手工业方面作精制细,在文化方面崇文重教,创造了灿烂的成都文化;另一方面成都人又善于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 一、古代成都人尚游好乐的历史成因

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

本文为四川省繁荣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城市文化卷》的前期成果。

〔作者简介〕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蓬勃兴盛。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民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善吸纳,重交流,勇创新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却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凸显出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等四大文化特质<sup>[1]</sup>。正是成都的这些特质,形成了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如果说具有辛勤劳动与开拓创新文化品质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少见,那么,在辛勤劳动的同时又善于享受生活的城市,也许成都可以称得上是其中之一。这正如有人所感言:“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sup>[2]</sup>

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一个城市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城市品牌。就成都城市文化而言,同样深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成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绚丽美艳的自然风光,造就了成都璀璨的城市文化<sup>[3]</sup>。成都座落在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的中部,其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成都平原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的气候特点和地理条件最适宜农作物生长。成都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等,物产尤为丰富。据《成都府志》载:“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岭青城瓦屋岷嶓环绕,周如城垣,而殖货业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导江,濬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开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sup>[4]</sup>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名,正如《成都古今集》说:“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sup>[5]</sup>可以说,平畴千里、气候温润、食物丰美、

风光绚丽的成都平原为农业时代成都独特的文化形态——崇文重教,惟美喜新,尚游好乐,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

成都自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sup>[6]</sup>。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庶的经济使成都在东汉末年就已赢得“天府之国”的美誉。而成都人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正是肇始于此时。隋唐时期,由于成都经济日渐发达,成都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工商繁华城市,世人称之为“扬一益二”,即当时论工商的繁华以扬州为第一,而益州(即成都)为第二。也有人认为成都的繁华实际上是超过了扬州,尤其是在唐中期黄巢起义军攻占扬州后,扬州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成都经济的繁荣便超过了扬州。由于经济的繁华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兴盛和游乐之风的盛行<sup>[7]</sup>。宋代,随着成都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交子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带动成都人对生活享受的追求,故而时人记载:成都人“游赏之盛甲于西蜀”<sup>[8]</sup>。元代,由于宋末元初的战争,导致了成都经济的破坏,特别是随着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成都呈现出相对的衰落,城市游乐之风也随之受到影响。明清两朝成都虽然经历过两次大的破坏,然而在城市的重建过程中,成都人仍然承袭了历史的文化传统,恢复和重构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成都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都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游乐之风又逐渐蔓延开来,正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载曰:“益州记曰尚侈,好文滥觞至今流而不逊。”<sup>[9]</sup>可见,尚游好乐不仅为成都城市文化之一大特色,而且实为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表现。

宋以来,对成都人尚游好乐多有记载描述,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关于成都人嬉游、娱乐、游娱、嬉邀、游邀的描述。在《岁华纪丽谱》中对成都人的嬉游、娱乐、游娱、嬉邀、游邀就多有描述,如成都

人一到节日,“扶老携幼,闾道嬉游”,“俗好娱乐”<sup>[10]</sup>。张咏也认为成都人“狂佚务娱乐”<sup>[11]</sup>。田况在《成都遨遊诗》中写道,“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sup>[12]</sup>，“予尝观四方,无不喜嬉游”<sup>[13]</sup>。他进而描绘了每逢佳节成都人“遂移踏青会,登舟恣游娱”<sup>[14]</sup>；“高会从嬉遨,丰岁愈繁盛”<sup>[15]</sup>。刘筠在《成都》一文中也说:成都人“镂肤剽俗姿游遨”<sup>[16]</sup>。

第二,关于成都人游宴、宴乐的描述。成都人重游乐,既重视精神上的娱悦,也重视物质上的享受,特别喜爱美食宴饮,故而美食宴饮是成都人游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潮所在。刘锡记述说:成都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sup>[17]</sup>。《成都通览》在记述四月初八日放生会的情形中也说:“富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sup>[18]</sup>除民间游宴外,官方组织的游宴更是盛大,如宋代大凡每有岁时节庆,成都府的官员都必定设宴,出席宴会的人员除官员外,还广泛邀请民间人士参加宴饮作乐,以至后来声势太大,闻于朝廷,而受到台谏弹劾<sup>[19]</sup>。

第三,关于“游赏”的描述。《岁华纪丽谱》称成都人“游赏之盛,甲于全蜀”<sup>[20]</sup>。每岁二月初二踏青节,“郡人游赏,散在四郊”<sup>[21]</sup>。庄绰记述到:“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sup>[22]</sup>。至四月十九日踏春泛浣花溪,成都人更是“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盛”<sup>[23]</sup>。连一生没有到过成都的词人柳永,也在词作中写道:成都人“雅俗多游赏”<sup>[24]</sup>。由此可见,在宋代,成都人的游赏之风兴盛已为世人所认同。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一方面已能窥见成都古代游乐之盛况;另一方面,还能感受到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不仅兴盛,而且丰富多彩。

## 二、享受自然与人文活动相结合

成都不仅物产丰饶,而且风光绮丽,四季皆充满秀色,这与秦岭、黄河以北的城市迥然不同,从而为古代成都人提供了享受不尽的美丽自然风光,故而成都人自古就喜爱欣赏自然风光,并且将

欣赏自然风光与人文活动相结合,其中以游江活动最为有名。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河流冲积而成,故河网密布,水源丰富,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发,水是成都的灵魂,是成都文化的重要载体,清澈的江流和波光滟潋的池塘,给城市带来生命和灵气,长期以来,成都人形成了亲水、乐水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游赏习俗——游江文化。春日赴锦江和西郊浣花溪游江,是成都人一年中的一件盛事,历唐末五代宋元明清千余年而相延不息。春日游江的习俗,本为唐末五代时期少数官员和士人为纪念曾在浣花溪边朴居过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及有功于蜀人的浣花夫人的游乐活动,后来因参与者越来越多,活动场面热闹非凡,故而成为官方参与并认可的大型游乐活动,除战争动荡年代外,几乎都是定期举行。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载:“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盛。”<sup>[25]</sup>

早在五代时期,前蜀后主王衍,后蜀主孟昶就曾在春日游浣花,对成都游江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张唐英在《蜀棹机》中记载:“前蜀后主王衍,(乾德)五年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sup>[26]</sup>后蜀后主孟昶也于广政十二年“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珠翠绮罗,名花异卉环列十里,望之如神仙之境”<sup>[27]</sup>。五代时期皇室贵族的巡游活动推动了民间游江活动的发展,及至宋代,游江已成为成都春日郊游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并形成了春季大、小两次游江的传统。“小游江”是指二月二日的游乐活动,因为此日的游江距离较短,游船主要从万里桥到宝历寺,其热闹程度也相对有限,故而称之为“小游江”。元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对“小游江”予以描述:“二月二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sup>[28]</sup>而四月十九日在浣花溪

上举行的规模浩大、热闹非凡的游江活动则称为“大游江”。宋代任正一《游浣花记》就曾描述唐末到宋初成都大游江活动：“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西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sup>[29]</sup>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蜀事颇多，亦曾记载游宴浣花草堂：“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邀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而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日而止，故最盛于他时。”<sup>[30]</sup>

明清时期，成都人的游江活动虽不及唐末五代、两宋之盛，然而也精彩纷呈，每年仍然是彩船花舫来来往往，官绅富商“或由北门上舟者，或由东门上舟者，或绕舟于南河者，或维舟于濯锦楼者。官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两岸之民家楼口，红袖绿，目不暇接。秦淮河之风趣，今日一见，白塔寺、望江楼，游人如织”<sup>[31]</sup>。由于游人过多，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如光绪己亥年（1899），“纪姓之争渡，人多舟覆，溺毙数人”<sup>[32]</sup>。光绪丁酉年（1897），因游人登望江楼，压力太重，“楼梯忽断，跌伤妇女十余人”<sup>[33]</sup>。

在成都的城郊游乐活动中，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游江活动外，还有游览寺庙宫观以及古迹名胜。其中，以正月初一日到南门外武侯祠游喜神方，游望江楼，游丁公祠最为热闹<sup>[34]</sup>。此外，还有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的习俗，以及在正月间朝拜石经寺的习俗。当然，成都人游览寺庙宫观以及古迹名胜的风俗，也无非是“借祭神之名，行游玩之实”。

### 三、经济活动与游乐活动相结合

成都人的尚游好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宋以后，一方面由于成都城市经济出现高度的繁荣，各种手工业商品和农副产品十分丰富，因而推动商贸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成都的寺庙文化发达，城内外寺庙林立，各种宗教信仰盛行，故而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兴

盛，推动了成都的商业贸易集市与寺庙文化、民间传统节日的游乐活动的结合。张澍《蜀典》卷六引《成都古今记》所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sup>[35]</sup>专业性和季节性的市场出现，既表明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反映了游乐活动的兴盛。每一次集市的举办，不仅有大量的商贸活动，而且还有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故而这些集市功能具有多元性，商业贸易与游宴饮兼而有之，成为古代成都人游乐活动的重要载体。

（1）逛蚕市。四川的种桑养蚕业自古就很发达，远在西周初期，蚕丝制品就成了四川的重要贡品之一，成都又是四川织锦业最繁荣的地方，古有“锦城”或“锦官城”之称。所以，成都的古蚕市也就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扩大应运而生。《方輶胜览》曾对古代成都的蚕市有过记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国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种，号曰蚕市。”黄休复的《茅亭客话·鬻龙骨》也说：“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中唐时韦皋曾写过一篇《蚕市记》，用以记述蚕市的有关情况。唐代每年参加成都蚕市的人达万人以上。进入五代之以后，成都的蚕市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蜀中每三月为蚕市，至时贸易毕集，阗阗填委”<sup>[36]</sup>。成都府城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不仅市场上挤满了进行蚕丝交易的商贩和农户，不少大街小巷也是人潮如涌，各种娱乐活动和食品摊贩也充斥其间，蚕市已然达到商业贸易和笙歌游乐的双重效果。

到了宋代，成都的蚕市贸易更加兴旺，除了交换蚕种、桑条、饲蚕工具及蚕丝制品之外，市场上还增设了酒食摊馆，增加了各种娱乐活动，诸如表演杂技和演奏音乐等。南宋淳熙时，成都太守田况曾在《成都遨乐诗》中，多次对蚕市吟咏讴歌，描绘它的繁荣景象。如《成都遨乐诗·五日州南门蚕市》一诗中便描述道：“游人炫识货，善价求珍

奇。予真徇俗者，行观亦忘疲。”<sup>[37]</sup>韦庄在《怨王孙》中也描写了成都繁荣的蚕市街景：“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蜩，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对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张仲舒在《蚕市词》中更是把成都的蚕市渲染得颇有诗情画意：“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可见，在举办蚕市的同时，各种戏曲及游艺娱乐竞技节目亦到会演出，宋代的蚕市已成为成都城乡民众游艺娱乐的中心。

(2)逛花会。成都传统的花会，又或称花朝、花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所谓花朝，指的是农历二月十五日，是古人给百花所确定的一个共同的生日。

五代时期，成都已是一座繁花似锦的城市，赏花则是上层王公贵族所钟爱的游乐形式之一，并经后蜀后主孟昶将赏花的风尚推而广之，民间也十分盛行。据《蜀梼杌》载：成都“尽种芙，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sup>[38]</sup>因此，成都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sup>[39]</sup>，“蓉城”的别名即由此得来。

宋代成都的梅花甚为有名，从城西青羊宫到浣花溪一带梅树成林，每当梅花盛开，香溢数里，故而陆游曾赞称：“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sup>[40]</sup>而在花朝节这一天，青羊宫百卉陈列，花农设圃卖花，游人争赏竞购，故青羊宫庙会又成为花市的集中地。北宋天禧三年（1019），在成都知府赵稹的进一步倡导下，“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浹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sup>[41]</sup>。逛花会已成为成都城内最著名的游乐活动之一。

进入明代，花朝成为中国各地的重要节令之一，就连明朝宣德皇帝也在花朝期间特地写过赞咏花会的御诗。明代诗人杨基在《浣溪沙·花朝》

中写道：“泥金镌就牡丹牌，明朝相约看花来。”明清时期，成都花会的地点逐渐转向城西青羊宫一带，因为二月十五日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同时也是百花盛开的日子，故而成都人将花会与庆祝“老子”生日相结合，遂每年在此举办为期一个月的花会，既举行传统的宗教活动，又举办赛花、赏花、购花等活动，同时也将其他商贸活动和娱乐活动加入其间。每岁农历二月十五日之后的一个月，成都及附近各州县的城乡男女俱来逛花会，拜神仙，做买卖，赏美景，尝美食。一首《成都竹枝词》，维妙维肖地描述了成都人畅游花会的景象，“锦江儿女爱春游，联袂看花上酒楼”；“端来凉粉两三盘，调味宜辣复宜酸；腮旁嘴角红犹在，就向街前念戏单”<sup>[42]</sup>。每到在花会末期，更是高潮迭起，各种重要的比赛和演出开始陆续举行，其中打金章比赛（武术擂台赛）云集了天下好手，拳脚相交，各见功夫；赛马会遍邀天下名驹，赛马现场精彩纷呈；戏剧、杂耍、歌舞等演出更推波助澜，共同把花会推向高潮，加上青羊宫“左右古迹甚多，百花潭、万里桥、二仙庵、老君台、张三丰字迹均可游赏”<sup>[43]</sup>。在明清之际，花会不仅是一次赏花大会，交易名木、名花，同时也是展销各种农副产品、土特产品以及奇珍异品的集会，更是成都府属及四川各州县人们一年一度的旅游高峰期，是人们祭拜神仙，祈求福祉，享受春天的欢乐盛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劝业道借青羊宫花会之期，举办“劝业会”，扩大场地，延长会期，邀集各县工商业者来此展销产品，“开会时，凡通省之物产及工业成品无不齐备。游人如织，实成都之第一热闹会场也”<sup>[44]</sup>。这是四川省所举办的第一次商品博览会，也是近代以来成都花会“旅贸结合”格局的开端。时至今日，成都依然有各种形式的花会，而且更加丰富多彩，如三月龙泉驿的桃花会，四月彭州的牡丹花会，八月新都的桂花会，十月温江的菊花会等，均是传统花会的延续与发展。

(3)逛夜市。宋以后，由于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夜生活也不再如坊市制时期平淡

乏味。自北宋初期始,官居府不再限制商店的开设地点和营业时间,撤销了夜禁制度,于是在一些热闹的商业街和娱乐场所,开始形成通宵营业的夜市。曾任成都知府的田况亲眼目睹了成都夜市的盛况:“万里银潢贯紫虚,桥边螭轡待星姝。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徧得无?”<sup>[45]</sup>

及至清代,成都的夜市已成为有固定街区,并具有相当规模的长期集市,每夜“百物萃集,游人如织”。成都夜市主要集中在东大街和西大街。上自城守衙门起,下至盐市口,大致可以分为四段:城守署至走马街口,以售卖饮食为主;由臬署起到新街口,以售卖寻常书画铜器等为主;新街口至鱼市口,以售卖古董玩器及鲜花等为主;鱼市口至盐市口,以售卖鲜花、旧书、玩具、洋货杂器、冠帽、首饰等为主。

夜市习俗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它成为城市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作息习惯、消费观念等,给城市经济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也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4) 逛灯会。元宵灯会在古代中国各地十分普遍,但成都的元宵灯会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地方文化特色。东汉时期成都就出现过“原始灯会”,即“五斗米道”的信众用“七星灯”来象征七星,举行“燃灯祭斗”仪式。这种仪式,尽管宗教对它取义不同,而人们乐于接受的却是观灯的乐趣。三国西晋时期,成都的元宵灯会已初具规模。唐代以后,每逢元宵佳节,成都城内外张灯结彩,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色。除了流动于街头巷尾的各色狮灯、龙灯、车灯,还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慈寺南的水灯,各种彩灯辉煌夺目,绮艳精致。初唐诗人卢照邻在《十五夜观灯》中描写道:“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sup>[46]</sup>可见当时成都元宵灯会的盛况和华美。五代时期,成都成为前后蜀的都城,由于君王的喜好,成都灯会愈加热闹。前蜀皇帝王建“出游浣花溪,自夜达旦,间亦放

灯,率无定日”。后蜀皇帝孟昶亦是在“上元观灯于露台”。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描写道:“半夜船游载内家,水门红蜡一行斜,圣人只在宫中饮,宣使池头旋折花。”<sup>[47]</sup>其时上元灯会将成都装点得五光十色,灯彩通明,如同白昼,故而连皇宫里的嫔妃彩女都按不住寂寞,深夜驾舟观灯,游赏美景。

宋代以后,在历任成都知府的提倡下,成都灯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都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就写到:“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宋代成都的元宵灯会不仅吸引了成都府属城乡居民前来观赏,而且也吸引了成都以外各府县城乡居民前来观赏,故而灯会期间,“人声震雷远,火树华星稠”<sup>[48]</sup>。

“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sup>[49]</sup>。

进入清代,成都经历了毁城后的重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故而在清中期,若干传统的活动又得到恢复,元宵灯会即为其一,每岁从除夕前二三天开始,各街各户便张灯结彩,大户人家的门庭外都悬挂“桶灯”一对,外罩红油纱,商家店铺之前则俱悬檐灯<sup>[50]</sup>。灯会从正月九日“上灯”始,一直点到正月十六日为止,“初九夜起,春灯彩胜,同时齐出,鱼龙曼衍,到处游行。繁盛街道,大都有牌坊灯,细木作架,涂以金漆,上段幕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十五后,始逐渐撤销”<sup>[51]</sup>。

《华阳县志·风俗》记载有成都元宵放灯的情形:“十五日谓之元宵,人家碎米为丸,曰汤圆。以相馈赠,市井祠庙,结棚张灯,光明如昼。间有猜灯谜者。”<sup>[52]</sup>有一首《锦城竹枝词》描写当时灯会的

盛况：“上元灯会搭灯棚，走马骛山数万擎，火树银花璀璨处，呼朋打谜胜登瀛。”<sup>[53]</sup>

民国时期，成都除个别战乱年代外，几乎每年都兴办灯会，除了正月有元宵灯会，清明节还有荷花灯会，秋高气爽的九月则有菊花灯会（亦名皇会灯）。时至今日，成都的灯会仍是精彩绝伦，名誉海内外。

#### 四、古代成都人游乐活动的特点

根据对《全蜀艺文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成都人游乐文化的诸多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时间来看，成都古代的游乐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时节或是节庆来开展的，如：正月的灯会，春日的踏青、登山，以及游江，夏日的夜市，秋季的赏月，岁末的祭祀等。尤其是大规模的游乐，更是集中在节庆期间。

第二，从地点来看，古代成都休闲游乐的地点相对集中，一是以锦江为纽带，带动两岸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二是以名刹古寺以及风景名胜区为主，如大慈寺、青羊宫、武侯祠、望江楼等，成为古代成都游乐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大慈寺每年定期举行的游乐活动达20余次；三是是以重要的商业街区为载体，如夜市、灯会等游乐活动则多设在城区的商业街区。

第三，从规模和参与者来看，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规模甚是宏大，游乐并非上层社会所独享，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广泛参与，可谓自老及少，均是游兴盎然，除了成都城区的居民外，成都府属各州县，以及外府州县的城乡居民都广泛参与各项游乐活动，故而每年成都的节庆游乐活动期间常常都是“士女骈集”，“倾城皆出”，并形成“游人如织”，“观者如堵”，“遨游空阔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局面。

第四，从倡导者来看，官府在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的发起与举办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对《全蜀艺文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关统计来

看，成都所定期兴办的游乐活动，均得到地方官府的倡导和支持，甚至有的活动是地方长官亲自参与其中，且设宴“以从民乐”。

及至今日，成都的游乐休闲活动在新的条件下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表现形式、时空分布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古时的赏花会、逛庙会、春游锦江等活动形式也向各式各样主题花会（如龙泉桃花节、新津梨花节等）、灯会、游江会转化，并且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曾中断了45年的成都大庙会也于2004年1月18日在传统庙会的举办地——成都文化公园正式开庙，后移至武侯祠举办。大庙会传统庙会游赏活动的民俗风情、民间工艺和独特的饮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现代成都的游赏休闲活动在运作方式上已经逐渐成熟，给成都市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对成都尚游好乐文化习俗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休闲之都、欢乐之都、祥和之都。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成都人在享受了大自然恩宠的同时，形成了热情开放，乐观向上，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开朗性格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成都人既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这座城市，同时也尽情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成都这种喜好游乐、善于休闲的文化习俗并非是消极的、不思进取的表现，恰恰相反，正是成都人对生活所具有的积极态度，是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表现，成都人在辛勤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善于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美好生活，从而形成了成都人张弛有道的文化心态。勤劳与闲适这两种看起来反差强烈的因素，在成都城市文化中却能和谐统一，这也正是成都城市文化突出的特色和优势之所在。传承数千年悠久文化而形成的成都精神，使成都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增添自豪感，并引导成都人不断提高生活品位，追求更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从璀璨的古蜀文明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城市文化，从茶馆小憩的祥和到

流畅时尚的动感,成都人不停地追逐着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追逐着生命的精髓和真理。正是这种“热爱生命、快乐人生”的精神,推动着成都人不断地追求、创造。

#### 【参考文献】

- [1] 何一民.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简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2).
- [2] 陈锦.市井成都[J].华夏地理,2006,(11).
- [3] 何一民主编.成都学概论[M].巴蜀书社,2010.
- [4]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5·食货志[M].巴蜀书社,1992.92.
- [5] (宋)范百禄.成都古今集·序[M].(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6] (东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M].
- [7] (唐)魏征.隋书·地理志[M].
- [8] [10] [20] [21] [23] [25] [28] [41]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下卷[Z].
- [9]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风俗志[M].
- [11] 张咏.悼蜀诗[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2]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序[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3]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上元灯夕[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4]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5]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6] (宋)刘筠.成都[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17] (宋)刘锡.至道圣德颂[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下卷[Z].
- [18] [31] [32] [33] [34]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244,74.
- [19] (元)脱脱.宋史·卷284·宋祁传[M].
- [22] (宋)庄绰.鸡肋编[M].中华书局,1983.20.
- [24] (宋)柳永.一寸金[A].全宋词·第1册[Z].中华书局,1965.
- [26] [27] [38] 王文才,王炎.蜀橐机校笺·卷4[M].巴蜀书社,1999,375-377.
- [29] (宋)任正一.游浣花记[A].成都文类·卷46[Z].
- [30]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M].中华书局,1979.
- [35] (宋)赵朴.成都古今记·说郭三种·卷62[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902.
- [36] 五国故事·卷上[M].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
- [37]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五日州南门蚕市[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Z].
- [39] (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说郭(宛委山堂本)卷62[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40] (宋)陆游.海棠[A].梅花绝句[A].陆游集[Z].中华书局,1976.
- [42] 花市竹枝词[Z].成都竹枝词[Z].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66.
- [43] [44]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第1册[M].石印平装本.30.
- [45]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上卷[Z].
- [46] (唐)卢照邻.十五夜观灯[Z].
- [47] (后蜀)花蕊夫人.宫词[Z].
- [48] (宋)田况.成都遨遊诗·上元灯夕[A].(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Z].线装书局,2003.431.
- [49] (宋)陆游.丁酉上元[Z].
- [50] 鞠廷琰,饶世权.川西古镇以特质文化打造品牌的研究[J].天府新论,2011,(1).
- [51] (清)周询.芙蓉话旧录·卷4[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49.
- [52] (清)华阳县志·卷18·风俗[M].
- [53] 林孔翼编.锦城竹枝词[Z].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邹一清)